

タイトル	進化论对日本文学近代化的影响：从江戸文学到明治文学(<特集>共同研究報告：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文化・文明のイメージ)
著者	千葉，宣一
引用	北海学園大学人文論集，6：89-99
発行日	1996-03-31

进化论对日本文学近代化的影响

——从江戸文学到明治文学

千 葉 宣 一

近代文学史上的断层

目前，由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致力于作为人的本质的新理念、新方法、新原理的探求，以及重建其广泛性的价值根据，因而正经历着一个剧烈的阵痛期。研究者们挑剔“美”的标本、寻找“思想”的残骸，变成为作品与作家的掘墓者或守墓人。究竟应当如何克服本身的职业悲剧呢？研究者们处于苦闷之中。事实上过去围绕着现代文学所做的通史性的展望与概论的考察都已过时，不足为凭。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不搞清现代文学史之所以产生断层的历史结构上的原因，那么，不论立足于何种观点和方法，要想重新构筑真正的文学史，已经是不可能的、毫无意义的了。

那么，最初的、而且是最大的断层产生于何时呢？它出现在从明治五年到明治二十三年这个时期。

在明治五年，一方面，宣布采用太阳历法，颁布义务教育学制，发表作为文教政策基调的“三条教宪”形成制约通俗文学作者思想与信仰自由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在大学南校的课程中，首次开设“文学”课，由雇用的外国教师 W·E·格里菲斯主讲。

在明治二十三年，发布了关于教育的敕语，召开了第一次帝国议会，围绕着《浮城物语》、《舞姬》的争论，对小说的社会作用与主题的积极性，以及美的自律性的本质等问题，有了现实性的觉醒。

根据明治五年二月发表的福泽谕吉的超级名著《劝学》初稿（庆应义塾出版局）的内容，在明治五年时，社会上一般对于“文学”的概念，是指关于儒学·和学的古典研究、和歌·汉诗的鉴赏创作等一般性的教养内容。但

是，在代表福泽最终“文学”观点的《文学之解》(《文学丛志》13、明治19 4 23)中，他又讲到，所谓“文学”“并非英语 Literature 之义”。他认为，“所谓文明之进步，乃指原则气氛统领之范围与日俱增”，这样，就否定了吟风月弄诗文这种中国式的“艺术”“文学”，而主张发展使原则统领的疆域不断扩大的“实学(自然科学)”“文学”。

到了明治二十三年，终于发表了三上参次 高津敏三郎‘开本邦文学之先河’的名著——《日本文学史》(上 下、10月、金港堂)。在其总论 第二章“为文学定义实为难事”一段中，围绕着“纯文学”问题，为文学做出了如下现代化的定义

“所谓文学，当是以某种文体、巧妙表达人之思想、感情、想像，以实用与娱人二者兼而有之为目的、向众人传播概要知识者。”

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上述定义，具体说明

“第一，采用某种文体。即，当作者各具其独特之妙，并将其形诸文字之时，应当采用某种特殊方法，如巧妙运用词语或修辞规则等。因而，诸如旅店客簿或银行帐目之类绝非文学。

第二，应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想像。如果文章仅限于表述思想，则是以培育智力为主，科学书籍多属此类。因则，应知感情与想像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在诗歌小说中，此种素材尤多。

第三，以实用与娱人兼而有之为目的。若要以实用，则成为纯科学之事，而文学必备条件之一，则是必须给读者以诸种快乐。

第四，向众人传播概要知识。虽然各种科学，如理化学、法律学、医学、工学等的书籍都各有其固定领域，但是欲行文学创作时，若要准确表述其文学内容，则必须博览群书。而且，文学所记之事一般仅为大体、概要之事，诸如科学上计算空气重量、讨论天神存在与否、确定流通货币价值之类，则并非文学之真谛。”

文学概念近代化与思想史背景

在从明治五年到二十三年期间，由但丁到勃德莱尔上下跨越五个世纪所

形成的多彩多姿的西欧文学，给将精神与上层构造区别开来的日本文学带来了急风暴雨式的冲击。莎士比亚、米尔顿、哥德、莫里哀、菲尔诺、雨果、佐拉、狄更斯、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卢梭、别林斯基等人的情况无秩序不均衡地传到日本，以他们为媒介，使得欧洲文学概念与传统的中国式的、国学式的文学观陷于互相抵触、并存、折衷、顺应这样的紧张关系的动荡之中，转换了文学史的座标，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的急速而带有根本性的一大变革时期。在“文学”之名下放射出的创造性能量（内田不知庵将其命名为“硬文学×软文学”，柳田泉将其定为“上层文学×下层文学”，中村幸彦则将其分为“第一文艺=雅文学=士君子文学×第二文艺=俗文学=妇幼文学”），在新旧、内外、上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互相联系、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多彩纷呈的“文学”共和国。

在这个期间，文学史研究的原有的中心课题是对下列内容进行历史动态分析与本质规定。(1)“文学”概念现代化的各种状况，(2)围绕着“文学”所形成的现代思考与方法意识，作为时代思潮的“现代思想”，特别是构成其核心的“进化论”于(1)和(2)的影响。

作为文学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基督教文化使得人们觉悟到许多问题。如世界性视野的确立、合理主义的思维、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神前万人的平等思想、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一夫一妻制的情爱、灵魂的自由等等。关于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接受状况，千叶宣一在《江户时代西洋诗的接受状况》（《国语国文研究》34，昭和41、6）中做了考察。

那么，作为文学概念现代化的标志之一，“Literature”这一名词最终确定译为“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呢？在文化七年发行的奥平昌高所著《兰语译撰》（Nieuw Verzameld Japans en Hollandsch Woorden Boek）中，曾将“Letter oefening”译成“文学”，但这个词的原意是文章训练。明治二年正月发行的《隆摩辞著》（English Japanese Dictionary SHANGHAI）中，将“Literature”译成“文字”，将“Letters”译为“文学”。而将“Literature”明确译定为“文学”并公开发表的最早文献则是明治十四年四月发行的《哲学字汇》（东京大学三学部印行）。然而，若说优先权的话，应首推在明治三年十一月以后的两、三年间，西周在育英舍的讲演——《百学连环》中的《觉书 笔记》一文。

然而,如果从不是玩弄虚妄的逻辑与空泛的观念,而是围绕着“‘现代化’在文学史上的特征”、“文学史上作为‘时代部分标准’的‘现代’”等问题做出真正明确的答案这个要求来看,以上的成果则还仅仅处于朦胧的思考状态。为了突破这种状况,以求得在现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整体性的复苏,就必须抓住一个基本课题,即,应该以上述断层为中心,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重新仔细地研究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潘塞社会进化论)不仅在十九世纪的科学思想史上,而且在人类史上,作为贯穿于文学、宗教、教育、政治、法律、社会学各方面的,引起人生观、世界观划时代思想革命的主要原理,成为了现代思想的熊熊火炬。

进化论在日本的开端

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C 达尔文撰写的《自然淘汰或生存竞争中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的第一版出版发行,据说当天就将1250本书全部售罄。这本书继地动说之后,将科学从神学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给予主张天地创造说的基督教教义和教理以决定性的冲击,因而被当作一种危险思想而遭到压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六版(72,明治五年)才第一次言及“进化”问题。至于人的进化,则不是在《物种起源》中,而是在《人的起源与性淘汰》(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1871)中加以考察的。另外,作为进化论的基本概念之一,H 斯潘塞提出了“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观点。在《物种起源》第五版(71,明治4)中,达尔文也认为“最适者生存”的提法比“自然淘汰”更正确,因而也开始使用这个观点。达尔文没有企图就“进化”的本质去下观念性的定义。应该记住的是斯潘塞在《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1862)中对“进化”所规定的定义 Evolution is an intermixture of matter and a concomitant dissipation of motion, during which the matter passes from an indefinite, incoherent homogeneity to a definite, coherent heterogeneity, and during which the re-

tained motion undergoes a parallel transformation.

据下出隼吉撰写的《菲诺罗隆与日本的社会学》（《社会学杂志》57，昭和4·1）记载，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日本最初得到介绍，是在明治七年。当时任丹生川上神社大宫司兼大讲议的葵川信近在《北乡族》（大教院）上展开的对基督教的批判中，涉及到了“进化论”

“英理学家太尔文说云，方世未有人类之前，有一种大兽，其大兽化生为各种之兽。其每化生，粗者为精者，猴族有数种，化生为猩猩，自猩猩化生遂为人类。三大教之所根处创世记，不待智考而知其伪撰也。然而今犹有闻彼教徒之言，陷眩惑民智之木，背开明文运而昏醉者，不胜失笑也。”

中村光夫在《日本的现代文学与文学家(2)——进化论的影响》（《朝日杂志》昭和52·2·4）一文中，对于从下出的文章中得到许多启示而深表谢意。渡边正雄所著《日本人与现代科学》（昭和51·1，岩波书店）、《明治初期的达尔文主义》（《西洋的冲击与日本》（昭和46·10，东京大学出版社）中，却完全无视下出先驱性的业绩，这是不可理解的。在传教士当中，也不乏达尔文的志同道合者。如S·基由里克从明治七年起活跃在关西，一面在同志社神学校供职，一面从事进化论的启蒙演讲活动，最终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完成了《新进化论》（明治43·11，博文馆），他的功绩也应当得到重新评价。但是，真正将达尔文主义引入日本的，则是东京大学的动物学首任教授E·S·莫斯先生。莫斯在《日本的每天》一文中不无自豪地写道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十月六日，我做了关于进化论的三讲中的第一次讲座。有多名教授偕夫人们以及五、六百名学生前来听讲。几乎每个人都做了笔记。能够在没有美国经常发生的因宗教偏见而导致冲突的气氛中讲解达尔文的理论，实为一大快事。一名日本教授对我说，这是在日本进行有关达尔文学说或进化论的首次讲演。”

这次讲义内容后来由莫斯口述，由石川千代笔录而编写成《动物进化论》（明治46·4万卷书楼）发表了。

另外，在《莫斯先生演说公告》中写到

“先生此次将把其平生所持‘人类祖先为野猿’的论点分为四次演讲，望同好诸君共听之。因挽近西教力主天帝创造万物、各物皆为天帝特意创造

之说，而与之持反论的达尔文氏则为世间万物皆因久经呈霸才逐渐演变有今日之形，并非天帝特意创造。达氏理论尚为我日本人所未熟知。本社此举由莫氏做反耶苏教义之演讲，为使世人去除偏听之弊，参考取舍其说，盖不无得益也。”（《生意气新闻》15、明治11 9 28发行。宫武外骨《文明开化》大正14 1、成光馆）

这篇公告将基督教文化与进化论相提并列，说明当时存在着吸引人们关心知识的时代风潮，所以这篇公告就成为了深受人们重视的宝贵资料。曾经亲身聆听过莫斯和菲诺罗隆的讲课，亲身感触到当时那种求知气氛的三宅雪岭所做的历史性证言可说是中肯恰当的见解

“莫斯极力推崇达尔文与哈克斯利，大学似乎立时为进化论所同化。虽然即使莫斯不来，同样的风潮迟早也会兴起，但莫斯本人的到来及其态度却有力地助长进化论风靡学界。”

关于 Evolution 一词的译定

明治五年到二十三年期间，也是学问至上主义形成的过程。菊池大麓在“学术译语固定论”（《东洋学艺杂志》6、明15 5）中，强调对学术用语规定统一概念的必要性，认为是使学术发展的最为必要之举。就如何将欧洲各种科学的专门用语的译语固定下来的问题，他指出

“现今专攻各学科的人们可相互结合而为团体，在各学会中讨论议定各专业的词汇。对于在两、三个学科之间相通的名词，可由各学会协商，将其固定下来。而且，广泛地推广到社会上的学者中去，将其修改得更为精确。若将这样译定的词汇公布于世，当今广泛地为人们使用。”

当时，Evolution 曾被译为“开方”、“开明”、“开进”、“淳化”、“化醇”、“变迁”等意。那么，又是何时，由谁将 Evolution 译为“进化”，将 Theory of Evolution 译为“进化论”的呢？其优先权当属文学部三级生船越哲次郎。他在明治十一年五年出版的、由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编纂的《学艺志林》第十册上，翻译过理学部教授W·艾德乌依巴逊讲述的《论宗教理学并非矛盾》。在译文中，曾出现“万物进化论、进化论的首倡者达尔文”的说法。后来，

以船越哲次郎为主，与和田垣谦三、国府寺新作、有贺长雄等人依据弗到冥的哲学字典共同完成了《哲学字汇全 附清国音符》一书，该书于明治十四年四月由东京大学三部印刷发行。在这本书中，除了将 Evolution 译为“开醇”、“开进”之外，也译成了“进化”。在将 Theory of Evolution 译为“化醇化”的同时，也译成了“进化论”，顺便提及一下，当时东大三学部的综理是加藤弘之，在围绕国家体制的现代化问题上，他从天赋人权论的立宪主义转而与自由民权论相对立，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支柱，从理论上武装走向帝国主义之路，是官学意识的旗手。

斯潘塞主义的影响

H·斯潘塞于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九日长眠之时，《帝国文学》（明37 1）曾载文表示深切的追悼之意。文中说，“我国近三十年的思想多蒙斯氏的影响。斯氏实为我国学木界的严师、引路人、我国得以达到今日之文化，斯氏与力多矣。”事实上，在明治二十二年五月的《哲学杂志》27号上，在评价谷本寓的《日本哲学现状》时写道“日本固有的哲学尚未产生，即使暂时以传入的哲学为满足，其现状亦颇为幼稚不振。而斯潘塞的思想却比过去传入的哲学流传得广泛的多。某外国人曾讲过，对于日本的斯潘塞热甚感吃惊。”据推测，“某外国人”当指由外山正一推荐担任文科大学的日本文学、博言学教师的B H·钱巴兰。他在《日本事物》（高梨健吉译《日本事物史》、昭和44·1、平凡社）一书中批评说

“日本人未曾有过自己的哲学，过去曾拜倒在孔子和王阳明的庙前，现在则又恭伏于斯潘塞的偶家之下。所谓被称为日本的哲学家的人们，只不过是外国输入思想的单纯解说者而已。”

的确，自明治十年以来，外山正一在英语教材中讲述 The Philosophy of Style（文体原理）、在历史学讲义中讲述 The First Principles（基本原理），在社会学教材中讲解 The Study of Sociology（关于社会学的学习），因而在东京大学被称为“斯潘塞论的鼓吹者。”实际上，外山发表在《新体诗抄》（明治15·7、丸家善七）上的创作诗《题社会学之原理》，首先是作为斯潘塞著

书、乘竹孝郎翻译的《社会学之原理》(明治15 4 东京经济学讲习会)的序文发表的,从内容来看,无非是从外山的渐进论立场来介绍斯潘塞的社会学。太田三郎所著《漱石文学观之一面——与斯潘塞哲学的关系》(《明治大正文学研究》6、昭和26 11、《斯潘塞哲学与〈新体诗抄〉》(《学苑》昭和27 7)及越智站雄所著《新体诗抄的背景》(《国语与国文学》昭和31 11)都是从文学思想史的发展中观测进化论动态的绝好文章。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明治18 9~19 4、松月堂)中讲到“优胜劣败、自然淘汰,实为无法抗拒之势”,从进化论的角度考察了“小说的变迁”。斯潘塞的“文体原理”不仅对坪内逍遥,而且对矢野龙溪的《日本文体文字新说》(明治19 3、报知社)等明治时期的各种文体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堪称开文体论之先河的《小说文体》(《明治协会杂志》明治16 9)就勿庸赘言了,就是在三游亭月朝所著《怪谈牡丹灯笼》(明治16 5,稗史出版社)的序文中,也论及“斯翁所言是,得以将真情显于言表者,于不觉之中遂成极妙之文章,自然得所辞之法”。《斯潘塞氏文体论补译》(《日本英语新志》明治25 3~12)一书从多方面分析了“思考 感觉的提炼所产生的语言力量”,其历史意义应得到重新认识。总之,已象《文学丛志》15期(明治19 6 8)的封面上饰以“斯潘塞照片”所象征的,斯潘塞热已如暴风雨般蔓延开来,“几乎家家皆有《关于社会学的学习》这类书籍”(末広铁肠《二十三年未来记》明19 5、博文堂)、“连小说都无不涉及政治,书中的恋人们也坐有树下谈论斯潘塞”(《西欧世界与日本》,金井丹他译、昭和41 2、筑摩书房)。

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明治三十五年一号的《学灯》曾向七十三人征求评选“十九世纪欧洲名著”的意见,结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三十二票荣膺第一。作家们也普遍对进化论关心起来,比如德富芦花在《回忆的记述》(明治34 5、民友社)中描写既苦读书本,又有着新时代的青春觉醒的主人公时,曾有“昨夜,向先生请教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描写。另外,国木田独步也在《酒中日记》(《文学界》明治35 8)中记述道“并非神高明地创造了人,而是人类杰出

地由猿进化而来。”然而，要说主要地接受进化论，并将其扬弃为文学世界观的一大支柱的最伟大的作家，当数夏目漱石。在他的藏书中有(1) The Origin of Species, J. Murray, 1902, (2)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J. Murray, 1901 Allen, Charles Darwin, 1855, Allen, the Evolution of Idea of God,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Religions, 1897

不仅藏书多，而且漱石还反复阅读消化。《小说〈エイルモン〉之批评》（《杜鹃》明治32·8）就清楚无误地表明了漱石的“进化论”观点。其《文学论》（明治40·5、大仓书店）的第五编第五章“原则的应用(三)”甚至可称为是对现代进化论的杰出的历史性的考察。而且，在《玻璃门中》（《朝日》大正4·1·13~2·23）中曾回想起在大学预科时期，曾向太田达人借用过斯潘塞的第一原理。《我们是猫》（明治36·10~40·5）、《行人》（大正3·1），以及《英文学形式论》（大正13·9）等，都受到进化论的深刻影响。据内田鲁庵的《二叶亭余谈——初次见面之印象》（《昨日今天》大正5·3博文馆）记载，二叶亭也曾接受到进化论的洗礼。书中写道，在初次见面的明治二十二年秋，“二叶亭满面含羞地说‘真不好意思，时刻今日，我才读到《种原论》这本书。你们会读英语书人，可以最早地读到名著，可见，在俄国，除文学书籍外，其他皆无。所以，连三岁孩童都熟知的名著，我却至今方能读到。’”这虽然是剖析二叶亭皈依文学之心，同时也是他接受进化论影响的明证。

遗留下来的课题

从进化论对社会学、政治学的影响而言，东大系的《下出隼吉遗稿》（明治7·4、下出民主义刊）、三田系的加田哲二的《明治初期社会思想的研究》（昭和8·5春秋社）、以及清水畿太郎的《日本社会学的成立》（《思想》昭和8·11、12）、永井道雄的《斯潘塞主义的传播》（《思想》昭和32·3）、山下重一的《明治初期对斯潘塞的接纳》（《年报政治学》1975、岩波书店）等著述文章都是有益的。但是，还必须对被引用的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对原典进行严密的评判。这就要求对鸟井博郎的《明治思想史》（昭和16·9，三笠书房）、麻生义辉的《大学的进化论哲学》（《近代日本哲学史》昭和17·7、近

藏书店)所进行的研究的历史意义与教训重新研讨。而且,首要约是要从“怎么可能建立文学思想史”这种对方法的怀疑转向方法的假设,必须围绕着学术的理念与原理的自立进行不断的探索。柳田泉著的《〈百学连环〉中表现出的文学知识》(《国文学研究》7、昭和11 11)、关田良一著的《关于有贺长雄的〈文学论〉》(《国语与国文学》昭和16·2)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前田爱的《幕末 维新时期的文学》(昭和47 10、法政大学出版社)、平冈敏夫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始》(昭和48 9、纪伊国屋书店)、越智治雄的《近代文学的诞生》(昭和50 9,讲谈化)等则起到引路人的作用,展开了大胆的妙思。现在,有一个实践性的课题,那就是必须设立一个价值标准,以便在文学概念的多重构造的问题领域中,使决定其生死因素得以再生。对于森有礼、田口卯吉、加藤宏之、马场辰猪、德富苏峰,特别是外山正一、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菲诺罗隆、小泉八云等人的文脉中所表现出来的“进化论·文学”观的常有个性的特点及相互影响的实际状况,在文明批评的水平上做微观的实证考察,这是解决上述课题的前提条件。

再者,畔柳芥舟在《比较文学上中下》(《新小说》明治40 3~5)中做过评价的,由布伦切尔著的《文学史上表现形式的进化》(*L'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re de litterature*, 1890)的接受状况,桐生悠悠在《由进化论观察自然主义》(《东京朝日新闻》明治43 1·3)中曾经断言“会遭到与在观念的生存竞争上败北相同的命运”的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本格森原著、金子马治、杜井当之助翻译的《创造的进化》(大正2年10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中对斯潘塞批判的反响等等,都是尚未涉及的课题。

最后要强调的是,由 Evolution 向 Revolution 的转变。由于进化论所起的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为一种渐进的变革思想,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能够获得发展的历史性前提。我们期待着从这种“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角度,构筑起文学思想史的视野。总而言之,由基督教神学世界向进化论世界的转换,是宣告“以人为中心世纪”到来的最基本的、历史性的标志。

进化论与基督教文明原本是对立的,在日本却有着同时都接受下来这样的特殊性质。从思想上走向日本的现代化,是随着现代化的引入,与全世界

同步开始的。

要旨

キリスト教神学の世界像から、進化論の世界像への転換か、《人間中心主義》の世紀としての近代の生誕を告知する基本的な史的指標である。日本における進化論の受容の諸相、並びに史的動態を分析する時、江戸から明治へ、「文学」観や文学的思考の方法のコペルニクスの転換に構造的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は、やはり進化論であった。本来対立すべきキリスト教文明との同時受容を特質としながら、日本の近代化への思想的離陸は、進化論の導入と共に世界的同時性において開始されたのである。Evolution から Revolution へ！ 進化論が果たした社会思想史的役割として重視すべきは、漸進論的変革思想として、マルクス主義の受容・展開の史的前提となる、精神の風土を育成したことである。神は細部に宿り給うと云う。「開方、開明、開進、淳化、化醇、変遷」等と試訳されていた、‘Evolution’を「進化」と訳出し、‘Theory of Evolution’を「進化論」と訳出したのは、イツ？ タレ！ か。そのプライオリティは、加藤弘之ではなく、明治11年5月印行の東京大学法理文学部編纂『学芸志林』第十冊で、理学部教授、W エトウキンパーソン演述「宗教理学相矛盾セサルヲ論ス」を訳した、文学部第三級生徒船越哲次郎（後の井上哲次郎）の功績に捧けられるべきであることを検証するなど、学説史、研究史の上で若干の創見を提起している。訳稿は、「中国における進化論の運命」との比較文化史的考察を構想している、学友、楊正光、朱福来両氏の協力の成果である。

※——※

原題：「日本文学の近代化に及ぼした進化論の影響—江戸文学から明治文学へ」
「1 近代文学史の断層 2 文学概念の近代化と思想史的背景 3 Evolution の訳語決定を巡る諸問題 4 スпенサー主義の影響 5 残された課題」